

哲學文本的語文學闡釋——甲柏連孜對 《太極圖說》的翻譯與闡釋

李雪濤*

摘要 作為19世紀德國最重要的語言學家和漢學家，甲柏連孜在漢語語法和普通語言學研究方面成就斐然。早在26歲時他便完成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博士論文《周子〈太極圖說〉》，並附有〈合璧性理〉中朱熹的註釋。本文以一手的文獻資料為基礎，對甲柏連孜的博士論文進行了系統研究。通過哲學文本的語文學閱讀方式、甲柏連孜對滿文的認識、博士論文內容處理方式等的分析，使我們認識到《太極圖說》對於甲柏連孜的意義。他的目標在於通過漢語等具體的人類語言研究，進入對語言本質的認識。而認識任何一種語言的本質，都必然要與生成這種語言的哲學、歷史、宗教打交道。因此，甲柏連孜的邏輯是從語言進入中國的精神世界，其最終的目的是重新回到普通語言學的研究。

關鍵詞 甲柏連孜；《太極圖說》；漢學；普通語言學

一、甲柏連孜生平及其對中國哲學的研究

甲柏連孜（Georg von der Gabelentz, 1840–1893）是19世紀德國漢學家、語言學家。他與同為語言學家的父親共同研究過200多種語言。1878年7月1日他被萊比錫大學聘為東亞語言學的編外教授。這一教席是他本人的倡議，並且是德語地區第一個專為東亞語言（漢語和日語）設立的教席。甲柏連孜還致力於滿文、蒙古語、藏語和馬來語的研究（圖1）。他的主要著作《漢文經緯》（*Chinesische Grammatik*, 1881）至今仍被漢學界認為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古漢語語法專著。¹1889年甲柏連孜被柏林大學聘為東



圖1·《甲柏連孜石板画像》，甲柏連孜曾外甥女福格爾（Annemete von Vogel）女士提供

*李雪濤，德國波恩大學文學哲學博士，現任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北外全球史研究院院長、《全球史與中國》主編。

文藝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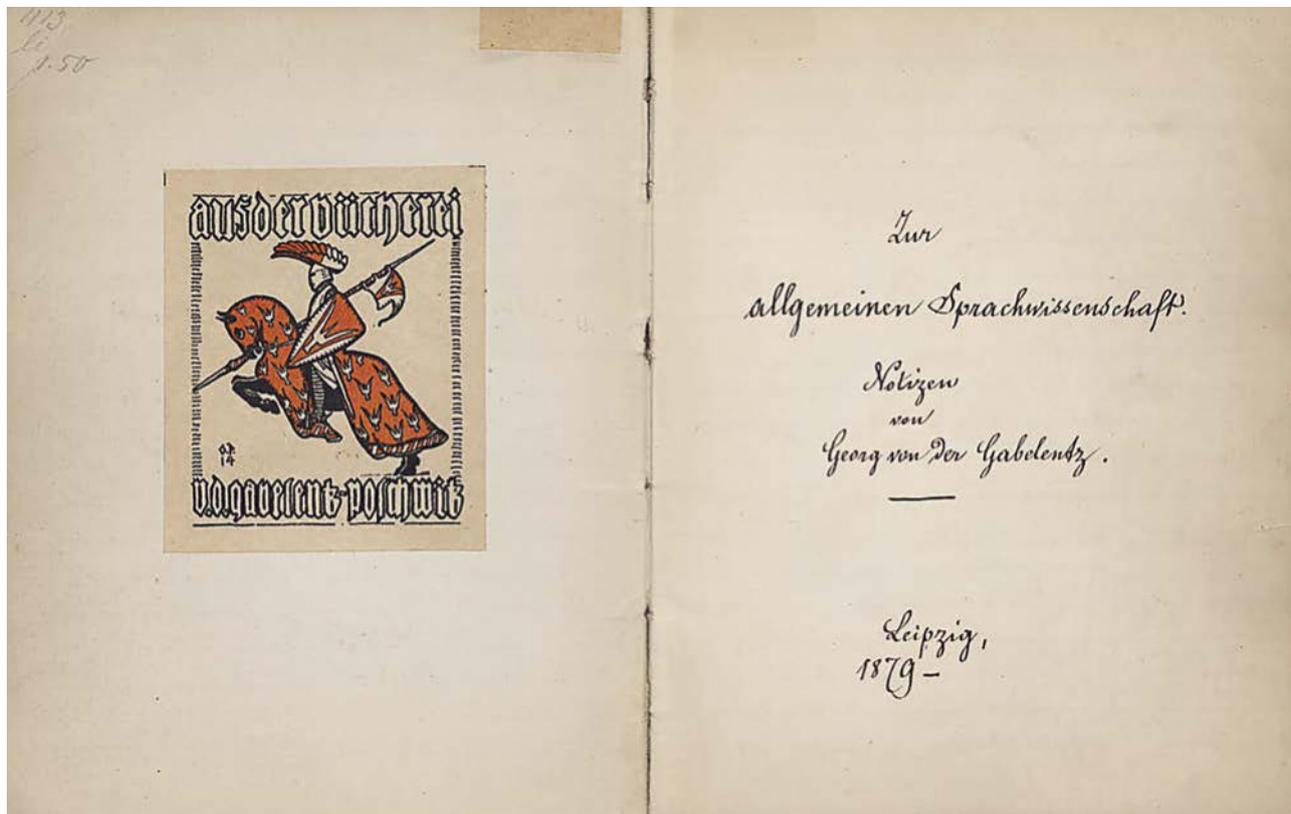


圖2：甲柏連孜的《語言學》札記本，1879年，阿爾滕堡市檔案館（LATH-Staatsarchiv Altenburg, Familienarchiv v. d. Gabelentz, Bucherbestand GIV a. 1. 1, S. 0）

亞語言與普通語言學教授，並於1889年6月27日被選為普魯士科學院（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院士。1891年，51歲的甲柏連孜出版了他的另外一部重要著作《語言學》（*Sprachwissenschaft*, 1891）。²在這部著作中，甲柏連孜創立了歷史語言學中的語言演變週期性理論（*Theorie des Zyklischen Sprachwandels*），並提出了語言學的目標和任務。令人扼腕的是，甲柏連孜僅僅活了53歲。在有限的生命中，他的很多宏圖大志都沒能得以實現（圖2）。

甲柏連孜於1876年在萊比錫大學做了他的博士論文。這是他一生中惟一一次用比較長的時間集中研究中國哲學。甲柏連孜一直對中國哲學懷有一種敬畏之心。1881年甲柏連孜發表了他於1878年在萊比錫大學的就職講演：《東亞研究與語言學》

（*Ostasiatischen Studien und die Sprachwissenschaft*）。在演講中，他專門提到了為甚麼要研究中國哲學：

讓我們嘗試著沉醉在中國哲學的秘密中，沉醉於他們深奧的形而上學、他們的樂觀與悲觀、他們的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情懷、他們對體制的種種抗爭、他們不斷進步的歷史——僅從那些如今能讀懂的吉光片羽中，我們知道了汗牛充棟的藏書的重要性，而當地的書目也向我們展示了這巨大的書籍寶庫：我們在前人描繪的那種千篇一律的精神面貌之上，看到了一場激烈的精神較量的演出，並在那位思想者黃色皮膚的中國式額頭上看到了深深的皺紋。那個以精神統治了人類總數的三分之二、令人稱奇的大智者，是一個中國人；人們要評價中國和中國人，就得知道儒家學說。³

語言是人類文明的一部分。很顯然，甲柏連孜希望通過漢學探索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哲學當然是這一探索的重要方面。但他的視野不僅僅局限在東亞的哲學範疇之內。他進而指出：

東亞研究打開了如此廣闊的視野，其未來是難以估量的。其任務首先是哲學的，這裡的哲學是從其最廣泛的意義上而言的。但是第二個任務也一點不輕：我所指的是語言學，這是拓寬和深化我們對於人類語言本質的認識。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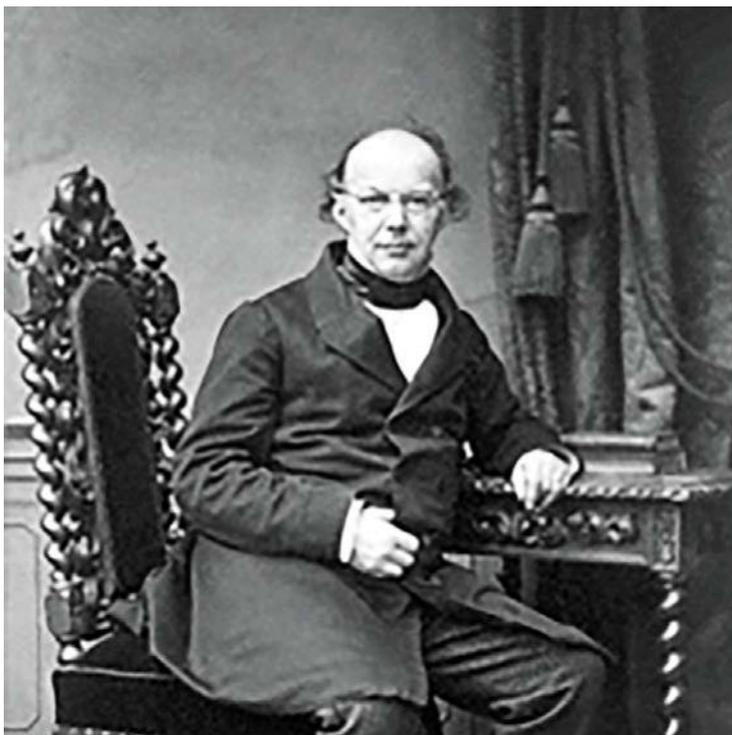
實際上，從甲柏連孜步入漢學界一開始，他就認為自己的使命在於東亞的哲學和語言學這兩個領域，並且認為這兩個領域是相輔相成、不可分離的。

甲柏連孜博士論文的兩個評閱人分別是布羅克豪斯（Hermann Brockhaus, 1806-1877）和弗萊舍爾（Heinrich Leberecht Fleischer, 1801-1888）。布羅克豪斯係著名的出版商弗里德里希·阿諾德·布羅克豪斯（Friedrich Arnold

Brockhaus, 1772-1823）的第三個兒子，當時著名的印度學家。他曾於1870-1871年擔任萊比錫大學哲學學院的院長，1872-1874年擔任過萊比錫大學校長。在甲柏連孜獲得博士學位的第二年（1877），布羅克豪斯便與世長辭了（圖3-4）。

弗萊舍爾是德國現代阿拉伯學的創始人，也是他同時代最著名的東方學家之一。正是由於弗萊舍爾的努力，使得萊比錫大學成為了世界著名的阿拉伯學研究重鎮以及阿拉伯文化在歐洲的中心，萊比錫大學也因此被譽為“阿拉伯學者的麥加”（Mekka der Arabisten）。由於在阿拉伯研究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1843年9月弗萊舍爾籌劃成立一個東方學家的學會。1845年10月2日德國的東方學家們仿照巴黎的亞洲學會（Société asiatique）成立了德國東方學會（Deutsche Morgenländische Gesellschaft），會址設在萊比錫。創始人包括甲柏連孜的兩位導師：弗萊舍爾和布羅克豪斯。學會會員的研究領域包括東方、亞洲、

圖3-4· 甲柏連孜博士論文的兩個評閱人：布羅克豪斯（左）和弗萊舍爾（右），出處：Wikipedia 照片



文藝研究

大洋洲和非洲的語言與文化，以及這些地區的相互關係，及其與相鄰地區的關聯性。

二、博士論文的內容與結構

甲柏連孜的博士論文是翻譯並解說北宋哲學家周敦頤的《太極圖說》：《周子〈太極圖說〉，並附有〈合璧性理〉中朱熹的註釋》（以下簡稱《周子太極圖說》）⁵。這是傳統的以語文學的方式對一個哲學文本進行的翻譯和闡釋。作為基本的文本，他所使用的係雍正十年（1732）刻版的《滿漢

合璧性理》。甲柏連孜寫道：“本書共有4冊，包括《太極圖》《通書》，最後是張子的《西銘》，但最後的兩部書從意義和興趣來講無論如何是沒有辦法與《太極圖》相提並論的；僅僅是為了更好地理解《太極圖》，並且獲得有關其作者更精確的知識，將《通書》翻譯出來就是非常值得的。”⁶我們都知道，今傳的《太極圖說》是朱熹（1130-1200）整理的。他認為：“太極圖得通書而始明（圖5）。”⁷

我們知道，周敦頤（1017-1073）的《太極圖說》全文僅250餘字，實際上是闡發他自己所繪製的《太極圖》。《太極圖》顯然源自道士的修煉之圖，但周敦頤對這幅圖進行了根本性的改造，即將其改為了天地萬物生成之圖。在“圖說”中，周敦頤對這幅圖的解釋為：有象有形的二氣五行和萬物，都源自原始的、絕對的實體“太極”，而太極就是無極，由它而產生出陰陽五行和宇宙間的萬事萬物。他以“太極”為本體，提出了宇宙觀、世界觀，說明了萬事萬物和人的產生，進而提出了無極、太極、動、靜、性、慾、善、惡、仁、義等範疇和概念。

《周子太極圖說》除了1876年2月寫於德累斯頓的“前言”（Vorwort，共5頁，V-VII）之外，其內容分為兩大部分：“引言”（Vorbemerkungen，共10頁，1-10）和“正文”（Text，共70頁，11-81），以及作為“附錄”（Anhang）的《朱子太極說》（共6頁，82-88）。“引言”主要是對《太極圖說》的思想加以總結和系統化，又包括了五個部分：

- I. 二元論 1
- II. 向一元論的過渡 3
- III. 周敦頤的一元論 5
- IV. “極”和“太極” 7
- V. 朱熹和“性理” 9

這一共10頁的“引言”基本上是一個中國哲學的入門。這部書的讀者顯然是當時德國的一般讀書人，他們很少有相應的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背景知識。

在第二部分的“正文”中，包括了“導論”（Einleitung）、周敦頤繪製的《太極圖》及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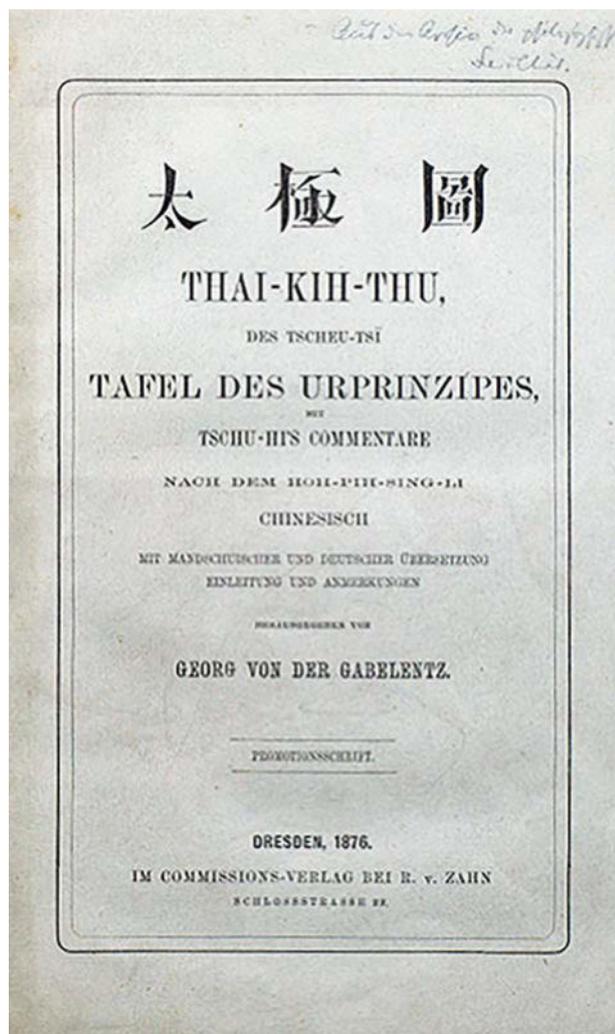


圖5·萊比錫大學圖書館藏《周子〈太極圖說〉，並附有〈合璧性理〉中朱熹的註釋》，出處：萊比錫大學檔案館（Universitätsarchiv Leipzig）

德文翻譯、周敦頤的《太極圖說》原文及翻譯，也包括朱熹的註及譯文。作為附錄的是《朱子太極說》，出自《朱熹文集》[明嘉靖十一年（1532）福州府學本/卷六十七]的《太極說》。由於這三個部分都被收錄在了《滿漢合璧性理》之中，因此在甲柏連孜的論文中，除了中文之外，也都羅列並分析了滿文，只不過滿文部分是使用拉丁字母的拼音方式給出的。

論文的最後兩頁是甲柏連孜的“簡歷”（Lebenslauf，共2頁）。

有關宋代哲學的內容，甲柏連孜在《漢文經緯》一書第一卷《導論和概述》中的“後古典文獻”中予以了定義：

§. 27. 宋代（960–1126）見證了一股持續不斷地推動哲學前進的力量。這股力量來自一些卓越的儒學家，他們試圖把全部自然哲學和精神哲學統一為一個宏大的體系。號稱周子的周濂溪（Ceū Liêm-k'î），二程（Č'ing）兄弟，還有偉大的朱熹（Čū-hî），是這些哲學家當中赫赫有名的幾位。他們所代表的學派追求一個稱為性理（sing-li）的系統，其內容載錄於一部多卷本的著作《性理大全》（Sing-li-tá ts'iuên）。《性理精義》（Sing-li-tsing-ngi）則是此書極佳的摘選本。⁸

甲柏連孜的這一段論述是作為“外部語言史”（Aeussere Sprachgeschichte）對宋代的哲學予以定位的。哲學文本也成為了他古代漢語語法分析的重要的文本（圖6）。

三、在漢學領域的首次登場

在撰寫博士論文的時候，甲柏連孜畢竟是26歲的年輕人。他知道在漢學領域自己僅僅是一個資歷很淺的入門者。在博士論文的前言中他寫道：“在擁有眾多著名前輩學者的漢學領域，我好像是第一次登場，希望讀到此書的當今袞袞碩儒能原諒我的無知。在東方學研究的領域中，漢學也許是至今依然很少被人開拓的巨大領域。”⁹

甲柏連孜所處的時代，在整個東方學的領域之

中，漢學的確鮮有巨大的成就出現。我想這正是甲柏連孜樂此不疲地進行漢學研究的原因。一直到1881年，他在“東亞研究與語言學”中依然表現出了對德國漢學研究狀況的擔憂：

漢學在德國的發展並不順利。我們在東方學的土地上耕耘收穫的卻是別的果實，甚至碩果累累！印度研究、伊朗研究、閃族研究以及埃及研究的輝煌成就纖毫畢現地呈現在這個文明世界面前；我們看法老和他的臣民們、穆斯林以及婆羅門簡直就像是相識已久的生意夥伴或是手足同胞一樣，恨不得趕快稱兄道弟，靜靜地聽著他們的歷史就好像小時候聽童話故事一樣。至於中國文化在這裡聽起來是甚麼樣子，反正聽著不像是人家本國的旋律。¹⁰

跟德國其他的東方學研究比較而言，甲柏連孜認為德國在漢學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依然是很差的，有待進一步提高。

四、為甲柏連孜樹立的翻譯典範

在“前言”中甲柏連孜指出，《太極圖說》意義非凡。“周子的著作所涉及到的是辯證思想的發展，甚至溯源到了二元論最初的單位：我認為這對於哲學專業的人來講也是不無興趣的，但首先我將我的這部論文獻給漢學家們，並非僅僅告訴漢學家一些新的東西，而是特別希望通過這篇論文更好、更清楚地闡明周子的體系，這對我來講似乎也是可能的。因為我常常感覺到，第一次的翻譯有多麼艱難，其中甘苦，儒蓮（Julien）在他的老子（Lao-tsi）翻譯中一定深有感觸，語言專家多麼需要其他領域的專家——比如哲學家在修改方面的幫助。”¹¹年僅26歲的甲柏連孜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漢學家，像周敦頤《太極圖說》這樣的哲學文本，並非僅僅從語文學的角度就可以翻譯、闡釋清楚的。因此他認為，哲學家的介入是非常重要的。

在此，甲柏連孜舉了儒蓮（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翻譯《老子》的例子。1842年儒蓮將《道德經》翻譯成了法文¹²。1856年他又將

文藝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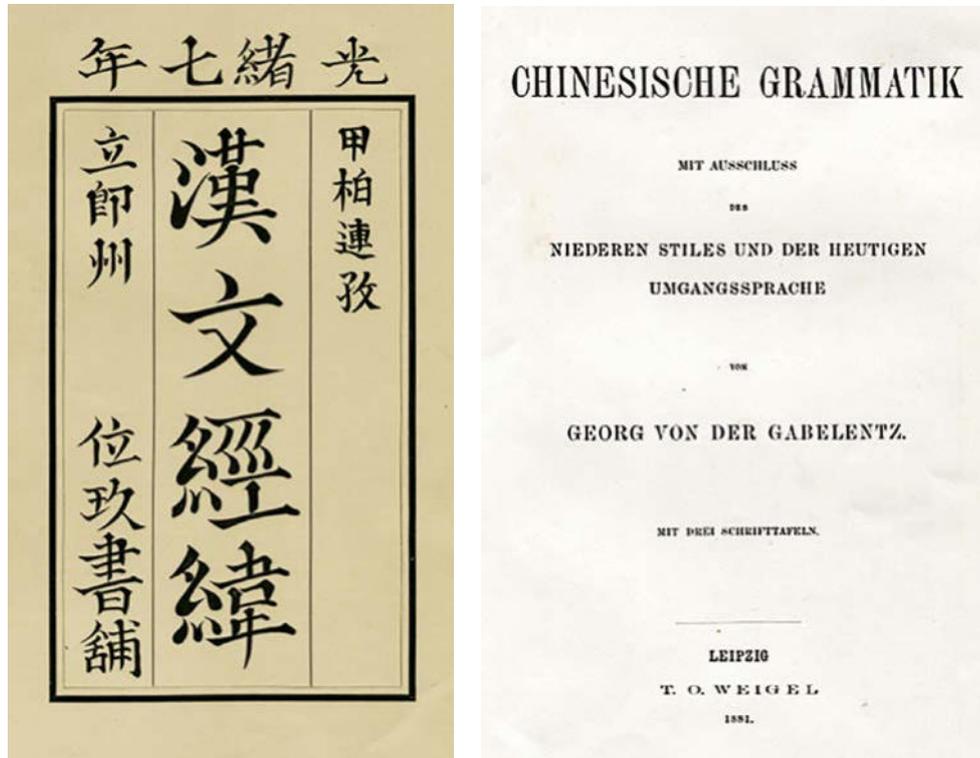


圖6 (左右) · 1881年《漢文經緯》第一版德文封面和扉頁，甲柏連孜曾外甥女福格爾女士提供

法文本轉譯成了英文本¹³，送給他的英國老師、倫敦會的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甲柏連孜認為，作為《道德經》的第一個西方語言的譯者，儒蓮最了解翻譯之難。因此，周敦頤《太極圖說》的翻譯對甲柏連孜來講，同樣是筭路藍縷的開創者的工作。

除了儒蓮之外，甲柏連孜提到他的榜樣應當是漢學家史陶斯（Victor von Strauss, 1809-1899）：“我想到了史陶斯，他的翻譯藝術為我提供了可供模仿的榜樣。他所達到的，是我追求的：將原作者的形式和思想儘可能予以忠實的再現。我會大膽地一再使用德語固有的表達方式，或者對意義不明確的篇章做了多義的處理，以便儘可能客觀地來看待不同的解釋，並添加由我自己的理解方式得來的註釋。在多種可能性的闡釋方式之中進行選擇的地方，我會在註釋中讓讀者對出現問題的地方予以關注，以便引出他們的批評意見。”¹⁴

甲柏連孜所提到的是史陶斯《道德經》的翻

譯。這本出版於1870年的德譯本是第一個德文的全譯本。¹⁵史陶斯的《道德經》譯本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翻譯，他對很多章節做了很好的闡釋。

史陶斯曾在埃爾蘭根大學、波恩大學和哥廷根大學學習法律。直到1882年他才在萊比錫大學成為神學博士。史陶斯如何學的漢語？跟誰學的漢語？都不太清楚。但是他受到過很好的神學和哲學的訓練，他的譯文被當時的學者奉為經典之作。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 1883-1969）對史陶斯的這個譯本予以了高度的評價：

史陶斯所作的註釋在於把讀者引向翻譯中的難點問題，中文原句的意義以及詞句的多種含義。此外，他受過傳統的德國哲學訓練，因此他的闡釋透徹、審慎，有時也帶點奇特的哲學味道。即便是譯文晦澀難懂，也會在註釋中找到他之所以這樣做的原因。在使用這一傑出的譯本同時，我還參照了其他新出的一些譯本。在發現這些新譯本跟史陶

斯的譯本有偏差時，再讀史氏的註釋，真令人信服不已，他會告訴你他之所以這麼譯的理由，並且常常是後來才出現的異議事先就能認識到。史陶斯這本乍讀起來令人費解的譯本，也許正因為此才是最好的譯本：這一譯本不易讀懂，需要借助於註釋的說明才能理解那簡短、含蓄的背後所隱藏的真意。¹⁶

托恩 (Willy Y. Tonn) 在1959年的瑞士蘇黎世新版序中認為，史陶斯的老子譯本不僅是最古老的德語譯本，同時也是最好的譯本。他同時認為，後來的很多德譯本，包括衛禮賢的譯本，實際上都是以史陶斯的譯本為基礎完成的。¹⁷史陶斯的譯本不僅僅是使用德國哲學的概念將老子的思想介紹給了德國的知識界，同時他也將老子的思想同西方的哲學家做了很多的比較。在他闡釋老子的文字中，就列舉了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德國神秘主義神學家艾克哈特 (Meister Eckhart, 1260-1327) 與伯梅 (Jakob Böhme, 1575-1624) 等西方歷史上的哲學家。我想，正是基於史陶斯老子譯本以上的優點，甲柏連孜才將之奉為圭臬的。

甲柏連孜後來在《漢文經緯》中，在分析用作狀語的“乃”時，舉了《道德經》第十六章的例子：“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甲柏連孜根據儒蓮的譯文，將這句話翻譯為：Wer beständig zu sein verseht, ist grossmüthig, ... gerecht, ... König, ... himmlisch, ... taò, ... von Dauer.¹⁸ 這段話的意思：如果誰懂得了甚麼是恒常的話，那麼他就會慷慨寬容；如果誰懂得慷慨寬容的話，那麼他就會公正；如果誰懂得公正的話，那麼他便會成為君王；如果誰懂得君王的話，那麼他就會成就天意；如果誰懂得天意的話，那麼他便會合乎“道”；如果有人認識“道”的話，那麼“道”便可以長久。不過甲柏連孜並不完全認可儒蓮的譯文。他接下來給出了所謂“更好的”譯文：grossmüthig, dann gerecht u. s. w. 意思是：只有慷慨寬容，才會公正，等等。他同時在括弧中給出了史陶斯的譯文：Wer das Ewige kennt, ist umfassend; umfassend, daher gerecht u. s. w. ¹⁹ 意思

是，如果有誰了解常道的話，那麼他便是無所不包的；如果有誰是無所不包的話，那麼他便是公正的，等等。可見，不論儒蓮的譯文還是史陶斯的譯文，對於甲柏連孜來講都只起到了參考的作用，不會泥古不化。

五、哲學文本的語文學閱讀方式

甲柏連孜認為，從《太極圖說》的“內容和形式來看，這些篇章更適合古漢語的初學者，正是為了這一部分的讀者，我在前幾頁加上了很多語言方面的註釋。我這樣做的目的在於，首先讓他們注意這些語法現象，在其後的閱讀文獻過程中，他們便可以獨立地來觀察這些現象了。一本印製出來的好的語法書，對於一種語言的新手來講，並不能免除他們去做讀書筆記，而此類的工作通過及時的、對值得注意的地方的提示，變得容易很多。”²⁰

因此，對於甲柏連孜來講，儘管《太極圖說》是一個哲學的文本，但是他的闡釋的方式，依然是語文學的 (Philologisch)。顯然，他的路徑 (Annäherung, approach) 是從語言到哲學思想。如果不理解漢語的詞彙和語法的話，很難理解文本的真實含義。

究竟怎樣才算是好的譯文呢？甲柏連孜指出：“對一部學術著作來講，好的翻譯要求是，專用名詞儘可能通過特有的、不過總是同一個表達來表達。”但他認為：“對中國哲學術語的整體探討，超越了我的工作範圍。”²¹ 因此，對甲柏連孜來講，這樣的一個哲學文本的翻譯和闡釋，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從語文學或語言學的角度來實現的。

在語法的解釋方面，甲柏連孜也做出了說明：“在語法的表述方面，我也沒用很多的篇幅。我認為，漢語詞彙的分類並不能以我們的話語分類範疇為基礎。一個漢語的詞，其基本含義是‘大的 (gross, 形容詞或副詞)，大人物 (Grösse, 名詞)’，這對我來講永遠都是形容詞 (Eigenschaftswort)，不過現在根據不同情況，也可能是形容詞 (Adjectivum)、名詞 (Substantivum)、中性動詞 (Verbum

文藝研究

neutrum) 或及物動詞 (Transitivum)，等等。因此，所有德文的表述方式表達的此類都是依據其基本的含義，亦即拉丁語的功用來表達的。”²² 也就是說，很難將漢語詞彙的意義和語法屬性同時“翻譯”成德語。

不論《太極圖說》，還是朱熹的解釋，都是用古代漢語寫成的。有關古代漢語詞形和詞類的問題，甲柏連孜很早就注意到了。因此，沒有基本的古代漢語語法和詞彙的分析，直接進入中國哲學的世界，甲柏連孜認為是不可能的。

有關古代漢語，甲柏連孜認為：“人們儘可能像學習其他語言一樣，純粹通過實踐和實證的方式學會它，但是如若沒有敏銳的哲學思考的話，那就不可能從學術的方面去研究它、理解它。”²³ 有關整個的中國精神財富與古代漢語之間的關聯性，甲柏連孜認為：

這一語言原本的形態就已經足夠說明一切了。它證明了自己作為重要文獻承載者的地位，能表達任何邏輯上的抽象化。它有著豐富的時代結構特徵，同時又短小精悍，並富有雄辯力和真摯情感。這些優點如此統一於漢語之中，這在其他語言中是前所未見的。漢語語法對學習者的記憶要求並不大，但是卻對其邏輯思維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通過背誦句型和逐一列舉不規則用法，漢語學習者可以減輕負擔。對此漢語學習者需要將自己的思想與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相適應；他不僅需要徹頭徹尾理解這種思維方式，還需完完全全去體會它……²⁴

我想，這也是為甚麼古代漢語特別吸引甲柏連孜的地方吧。

當時德國漢學研究落後於英國和法國的情況，因此甲柏連孜在作註和進行闡釋的時候，引用的雙語詞典和一些譯本基本上是英文或法文的。其中中國典籍的譯本包括：

Legge, *Class.*, Vol. I, pg. 18. (S. 14)

Legge, *Chin. Class.*, Vol. III, Pt. II, pg. 321 sq. (S. 12)

Legge, *Classics, Schu-king*, pt. V, b. XXII. § 19 (S. 12)

這實際上是理雅各 (James Legge, 1815-1897) 在1861-1872年出版的《中國經典》 (*Th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 5 vols., Hong Kong: Legge; London: Trubner, 1861-1872)。至1876年甲柏連孜撰寫博士論文的時候，已經出版了《論語·大學·中庸》 (卷一, 1861) 《孟子》 (卷二, 1861) 《書經》 (卷三, 1865) 《詩經》 (卷四, 1871) 《春秋·左傳》 (卷五, 1972)。其餘各卷都是在1876年之後完成的。

論文中所引用過的雙語詞典等工具書包括：

Dennys, N. B., *Notes u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 Hong Kong: C.A. Saint, 1867-1870. vol. I. pg. 147 (S. 43)

Julien, Stanislas, *Syntaxe Nouvelle de la Langue Chinoise, Fondée sur la Position des Mots, suivie de deux traités sur les particules et les principaux termes de grammaire, d'une table des idiotismes, de fables, de légendes et d'apologues, traduits mot à mot. - Syntaxe Nouvelle de la Langue Chinoise, Confirmée par L'analyse d'un Texte Ancien, Suivie d'un Petit Dictionnaire du Roman des Deux Cousines et de Dialogues Dramatiques* (2 volumes, 1869-1870) I, pg. 140. (S. 19) / vol. I, pg. 247-248. (S. 29) / I, pg. 109 (S. 79)

Mayers, William Fredrick, *Chinese Reader's Manual: A Handbook of Biographical, Historical, Mythological, and General Literary Reference*, London / Shanghai, 1874, pg. 34. (S. 16) / pg. 309, 314. (S. 43)

Schott, Wilhelm, *Chinesische Sprachlehre*, Berlin: 1857, S. 57, 160 (S. 79)

Schott, Wilhelm, *Zur chinesischen*

Sprachlehre, Berlin: 1857, S. 33. (S. 79)

Williams, Wells, *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Wu-fang Yuen Yin, with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Characters as Heard in Peking, Canton, Amoy, and Shanghai* (《漢英韻府》),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4, pg. 926. (S. 13) / pg. 285. (S. 50) / (S. 75)

William, Wells, *A 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Canton Dialect* (《英華分韻撮要》), Canton: Printed at 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56, pg. 965. (S. 20) / pg. 792. (24)

當時德漢、漢德雙語的詞典依然很少，因此甲柏連孜所使用的大都是英文和法文的雙語詞典。其中有些詞典在當時特別新，像衛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 編寫的1254頁的《漢英韻府》，是1874年才在上海美華書館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出版的。可見甲柏連孜在學術方面的資訊還是非常靈通的。

六、選擇使用《滿漢合璧性理》的原因

甲柏連孜之所以選擇了《滿漢合璧性理》，而沒有使用《朱子語類》的版本，或者明代的《周濂溪集》，或清代的《周子全書》，或清代的《太極圖集解》，最主要的原因在於，甲柏連孜認為滿文可以加深他對中文原文的理解。就此他寫道：“我附上了滿文的譯文，其原因並非是因此可以增加可供參考的文本文獻，而是想要引起對批評的關注。無視這些當地闡釋者的闡釋是理應受到懲罰的。我們要有自己的看法，不得不在這些本地學者的觀點面前進行辯解，並且常常跟他們的觀點相左的。因此我常常記在心頭的是，我知道在哪些地方我的觀點是與滿人學者的觀點相反的。在我的註釋中，只是在涉及到實質性內容方面，我才想到這些偏差。我們的理解與滿文學者在形式方面不同的眾多事例，讀者自有分明。”²⁵

在甲柏連孜看來，滿文的翻譯和解釋對於他理

解這個中文的哲學文本是至關重要的。如果只有漢語原文和解釋的話，理解的視角常常是比較單一的。滿文的譯文給甲柏連孜提供了亞洲另外一種語言文化對周敦頤和朱熹的不同理解。儘管甲柏連孜常常不同意滿文的翻譯和解釋，但這無疑為他的翻譯和闡釋提供了另外一條路徑。

甲柏連孜後來在《東亞研究與語言學》中更清楚地闡述了他的這一認識：

對於滿族在中國的異族統治，我們漢學應當在很多方面都應當予以感謝。最重要的當然是滿文文獻。滿文文獻數量並非卷帙浩繁，並且只能算是其原本精神財富中微乎其微的一部分。但是他們將諸多重要的中文文獻用方便的字母文字翻譯成了易於學習的語言，這些譯文並且被認為幾乎是可靠的，現存的這些文獻，即便是今天對我們的幫助都是不可估量的。任何歐洲的漢學家都不可忽視滿文。²⁶

由於清代是滿人統治，歐洲的東方學圖書館藏有很多類似於《滿漢合璧性理》的滿文—漢語對勘的中國典籍。當時訓練出來的德國東方學家的滿文和古漢語水平都很高，原因在於滿文是拼音文字，對於德國漢學家來講更容易掌握，因此滿文的翻譯對於他們理解中國思想還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的。由於此類的“滿漢合璧”圖書雙語的特色，中文方面的校勘往往不是特別精良，常常會有一些刻版的錯誤。甲柏連孜也發現了《滿漢合璧性理》的“中文部分並非總是正確的”。²⁷

滿文是中國清代皇室的語言，也是打開中國皇家宮殿大門的重要手段。當時柏林的王室圖書館 (Königliche Bibliothek zu Berlin) 從17世紀以來除了中文藏書外，也採購一部分滿文圖書。滿文文獻為語言學家和漢學家掌握中文，進而研讀中國文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幫助。因此，當時王室圖書館所收藏的滿文文獻，也大都都是滿漢合璧的。柏林王室圖書館便藏有諸如康熙十五年 (1676) 刻版的《滿漢合璧朱子節要》 (五卷)²⁸，係朱子語錄及滿文譯文的雙語對照版。

在滿文方面，甲柏連孜也可謂有深厚的家學背

文藝研究

景。作為當時著名的語言學家，他的父親漢斯·克農·馮·德·甲柏連孜（Hans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1807-1874）一生中用科學的方法處理過80餘種的語言。據說老先生能說其中的24種語言，不過他對滿文情有獨鍾，一生翻譯了很多滿文的文獻。²⁹ 甲柏連孜本人也曾在做完博士論文之後，於1879年將部分的《金瓶梅》從滿文翻譯成了法文，發表在了當時著名的《東方與美洲評論》上。³⁰ 此外，從1878年冬季學期（Wintersemester, WS）的10月中旬開始，到1889年冬季學期的2月中旬為止（德國大學一般分為冬季學期和夏季學期（Sommersemester, SS）兩個學期），甲柏連孜在萊比錫大學教授東亞語言、文化的十一年中，講授過“滿文文法入門”（WS 1878 / WS 1879 / WS 1880 / WS 1881, Anfangsgründe der Mandschu-Grammatik）、“滿漢對照太極圖解”（SS 1879, Erklärung des Thai-kih-thu (Chinesisch und Mandschuisch)）、“滿文文法”（WS 1882/ SS 1884 / SS 1885, Mandschu-Grammatik）、“滿文”（SS 1886 / SS 1887 / SS 1888 / SS 1889, Mandschu-Sprache）。³¹ 可見，對於甲柏連孜來講，滿文是理解東亞文化特別重要的一把鑰匙。

甲柏連孜在《漢文經緯》中對滿族和滿文也做了精彩的論述。（圖6）他指出：

§. 48. 滿族則不同。自從1644年進佔中原，滿族人一直熱衷於學習漢語並掌握漢文獻，做得非常成功。康熙（1662-1723）和乾隆（1736-1796）是中國歷史上最優秀的皇帝當中的兩位，而且都是一流的學者，在位期間曾下令把大量上乘的漢籍譯入滿語，使它們在滿族人中間普及開來。這些翻譯作品的絕大多數成為權威的版本，其中有一些本子的譯筆極佳。這批作品尤其為歐洲人研究漢學鋪平了道路。今天我們研究漢語，必須同時學習滿語，絕不應該忽視這種語言。³²

不論是漢語還是滿文，對於甲柏連孜來講都是

外語。他之所以不遺餘力地掌握如此眾多的語言，在於他有這樣的認識：“任何對於陌生精神世界的語言習得都同時是一種打破諸多偏見的行為，而這些偏見正是從我們之前習得的語言中附著而來的。”³³ 掌握一種從結構和形式上來講完全相異的新語言，對甲柏連孜來講，是“為我們打開了一個嶄新的精神世界”（erschließt sich in uns eine neue Gedankenwelt）³⁴，可以反過來更好地理解自己。

七、內容處理的方式

博士論文最重要的“正文”又分為兩個部分：其一是“導論”（Einleitung），主要是綜合了朱熹的《江州重建濂溪先生書堂記》、《周子太極通書後序》以及其他相關文字而成。甲柏連孜將此分為20個部分進行了滿文的拉丁字母轉寫、德文翻譯工作，並且做了詳盡的註釋。除了一般意義上的哲學闡釋之外，對於語言學家的甲柏連孜來講，更重要的是他對很多的概念從語文學的角度做了詞源學方面的解釋。其後是周敦頤繪製的《太極圖》及其德文翻譯。其二是接下來分為10節對《太極圖說》進行的翻譯和介紹，包括：1. 太極，2. 陰陽，3. 五行，4. 太極一也，5. 乾坤、萬物，6. 人，7. 聖人，8. 君子、小人，9. 三才之道，10. 易經。除了周子的原文外，也包括了朱熹的註。

在朱熹的“導論”中，中文原文下面分為左右兩欄：左欄為滿文譯文，右欄為德文翻譯，其下是甲柏連孜的註釋和闡釋。以第2節為例，中文原文為：“而孔子於斯文之興衰，亦未嘗不推之於天。”滿文是《滿漢合璧性理》中相應的甲柏連孜轉寫成拉丁字母的部分：Kungze ere sú-i yendehe gukuhe be, inu abka ci fisembuhekôngge akô. 之後是德文翻譯：Und Khung-tsi, anlangend das Erstehen und Vergehen dieser Lehre: Alles schreibt auch er dem Himmel zu. (S. 13)

在下面的解釋中，甲柏連孜認為，朱熹的這句話顯然在暗示孔子（Khung-tsi, Confucius）在《論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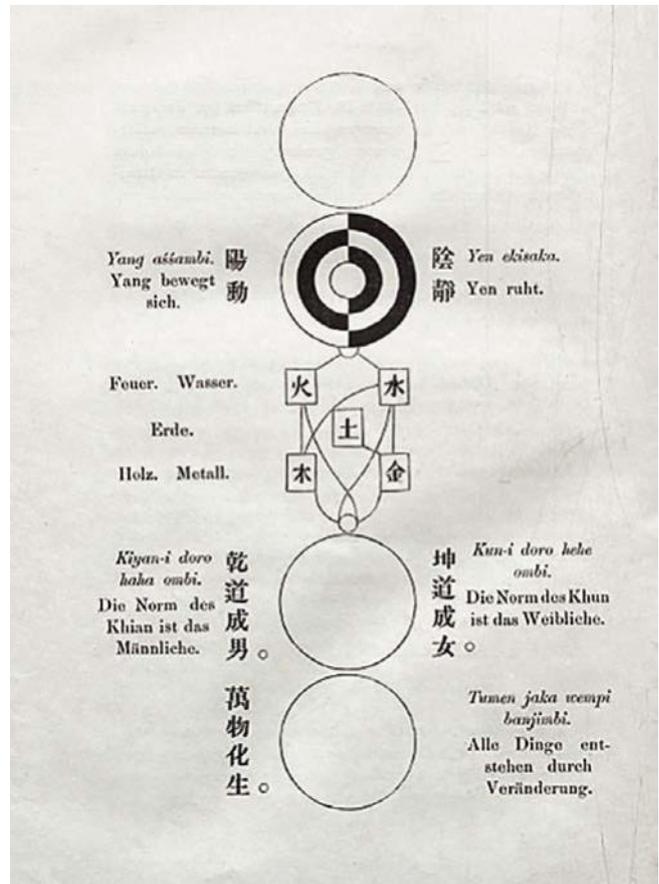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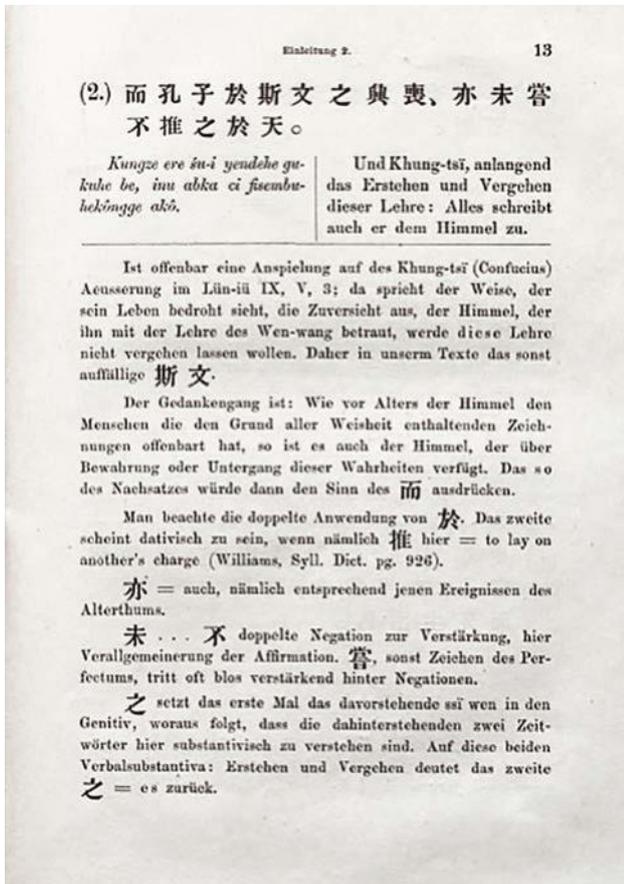


圖7-8·《周子〈太極圖說〉，並附有〈合璧性理〉中朱熹的註釋》第13頁朱熹的註釋及第30頁“太極圖”，出處：萊比錫大學檔案館

(Lün-ü) “子罕”中的一句話：“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IX, V, 3) 他解釋說，當時孔子危在旦夕，上天委託他以文王的學說為使命，不要滅絕這一文化。因此，在文中使用了引人注意的“斯文”一詞(圖7-8)。

甲柏連孜認為，古漢語僅有兩種所謂的語法要素：固定而清晰的詞序規則和說明性的助詞(虛詞)。³⁵ 因此，除了一些中國文化史方面的解釋之外，甲柏連孜更多地是對他認為重要的“虛詞”進行了解釋。1. 首先，這句話一開始使用了“而”字，他認為這是一個“後置從句”(Nachsatz)，所以之前使用了一個虛詞“而”字。2. 之後他解釋在這句話中兩次使用了“於”：他認為，第二個“於”只是用來體現第三個賓語的(dativisch)，相當於“推”

的賓語。他的依據是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的詞典《漢英韻府》(1874)中的解釋為“to lay on another's charge”。(Williams, Syll. Dict., p. 926) 3. “亦”解釋為“也”，是與古代的事件相適應的。4. “未……不”是一個雙重否定詞，用來加強說話的語氣，從而得出肯定的結論。5. “嘗”本來是用作表示完成式(Perfectum)的助詞，這裡常常僅用在表示否定的詞後以加強語氣。6. 解釋了句子中兩個“之”的用法。甲柏連孜認為，第一個“之”之前的“斯文”(ssi wen)是第二格(Genitiv)，表明後面的兩個動詞(Zeitwörter)是動名詞(Verbalsubstantiva)；後一個“之”代表之前的“興喪”。

滿文的譯文，在很多方面為甲柏連孜理解古代漢語的文本提供了說明。同樣在朱熹的“導論”之

文藝研究

中，其中第12節的一句“潘清逸誌先生之墓，敘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為稱首。”（S. 22）由於“潘清逸”本來就不是特別著名的學者，這整句話的邏輯關係，甲柏連孜是通過滿文的翻譯弄清楚的。實際上，潘清逸（潘興嗣，約1023-1100）為好友周敦頤所作的“墓誌銘”中將《太極圖》居首，對朱熹影響很大。朱熹也因此成為了第一個肯定《太極圖》的意義並以《太極圖解》和《太極圖說解》（1170）對《太極圖》做出系統詮釋的哲學家。

八、當時德國學者對於《太極圖說》 博士論文的評價

1876年3月甲柏連孜在萊比錫大學提交了他有關《太極圖說》的博士論文。儘管他的博士論文傳播的範圍有限，但當時讀到這部論文的學者還是予以了很高的評價。論文的評閱人之一、之前擔任萊比錫大學校長的布羅克豪斯寫道：

請不要讓我對您論文的內容做任何評價，因為“陰”和“陽”是我一直以來討厭的概念，並且朱熹也沒能讓我贊同此類的觀點。但是，您運用語法-句法的處理方式，我認為是非常成功的，也是適當的：您對中文文本的可靠解釋，都是建立在有關漢語中虛詞準確的知識基礎之上的。³⁶

因此，儘管布羅克豪斯對道學中太極之類的概念並無好感，但甲柏連孜使用語法分析的方式來解釋哲學文本，依然給布羅克豪斯耳目一新的感覺。之後，甲柏連孜在給他最喜愛的妹妹克萊門蒂妮（Clementine v. d. Gabelentz, 1849-1913）的信中寫道：

碩特，我向他明確表示，我最好從他那裡得到責難而不是褒揚。他希望毫無顧忌地提出尖銳的批評，昨天他在給我的信中寫道：您的論文所涉及到的《太極圖》，或者您對《太極圖》的解釋，我在認真閱讀了之後，可以憑良心確信，我認為在這一領域可

圈可點的成就並不多。對於一些次要的東西人們儘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這並不影響對於根本東西的公正判斷。我很遺憾不能讓您高興，您可能認為這是一個不利的評價。³⁷

碩特（Wilhelm Schott, 1802-1889）自1833年在柏林大學講授漢語和中國哲學的課程，1838年他獲得“漢語、韃靼語及其他東亞語言專業”編外教授的職位。在當時，碩特可能是唯一能從語言和哲學兩個方面對甲柏連孜的論文做評價的德國學者。在1876年5月17日甲柏連孜寫給妹妹的信中，他對碩特予以了很好的評價。甲柏連孜寫道：

八天前我在柏林訪問的碩特教授。這位儘管已經老了但依然精力充沛的先生對我充滿了善意，並且也很理解我的志向。³⁸

在當時的德國，並沒有很多學者能對甲柏連孜的題目做適當的評價。儘管碩特對甲柏連孜的博士論文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甲柏連孜不僅不以為杵，反而欣然接受了。《荀子·修身》篇中有一句話說：“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我想所說的正是26歲時甲柏連孜的情形。

九、結論：特殊性與普遍性的辯證法

《太極圖說》影響著甲柏連孜一生的研究。在《漢文經緯》的第二卷“分析系統”中，在講到副詞充當謂語的位置時，他舉了《太極圖說》中“流行古今、不言之妙”的例子。³⁹除了早年的博士論文外，甲柏連孜對中國哲學的興趣非常大，其後涉及到中國哲學的文章有：《道家著作文子》⁴⁰《論中國哲學家墨翟》⁴¹《盜蹠——莊子中具有諷刺性的一段》⁴²《論中國哲學》⁴³。除這些有關中國哲學的論文之外，甲柏連孜還為《科學與藝術普通百科全書》（Ersch u. Gruber, *Allgemeine Encyclopäd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Künste*. “H-Ligatur” (2. Section, geplant als “H-N”) in 43 Bänden, 1827-1889) 撰寫了一些詞條，其中包括“孔夫子”（Kung-fu-

tse) 和“老子”(Lao-tse)。可以看出，甲柏連孜對中國哲學的興趣是貫穿其整個一生的。

甲柏連孜一生中研究過當時已經發現的大多數語言。他的目標是通過漢語等具體的人類語言研究，進入對語言的本質的認識。他問道：

人們會問：觀察這樣一副色彩斑斕的圖景到底是為了甚麼？如果我了解了整個地球上一定數量的語言，那我所擁有的和一間古董陳列室有甚麼差別？它們內在的聯繫在哪裡？科學性又在哪裡？……現在我問我自己：這種語言能力是語言學的研究對象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難道不是得通過語言學來給它下個定義嗎？但是如果我們還沒有將語言發展的所有可能性都了解一遍，又怎麼能給它下定義呢？⁴⁴

因此只有當所有的人類語言都被研究過之後，人們才能掌握語言學的基本規律。而進入任何一種語言之中，都必然要與這種語言的哲學、歷史、宗教打交道。因此，甲柏連孜的邏輯是從語言進入中國的精神世界，最終的目的是再回到普通語言學的研究。甲柏連孜指出：“只有當一種語言構成我們的一部分‘自我’時，我們才能夠評判它的優點和弱點。”⁴⁵

儘管甲柏連孜沒有活過一個甲子，但他在1878年的就職演講中卻展示了他的雄心壯志：“為了掌握人類語言財富全部的可能形式，我們必須認清一切語言的發音、詞素和句法手段以及每個個體面對邏輯和心理要求時的行為。”⁴⁶如此抱負的一部分，經過他對中國哲學和古代漢語語法的研究得以實現。他指出：

顯然，要實現這一點，只有對所有，或者說傳統觀點中所有更重要的語言進行窮盡性的語法研究。而研究單個語言的任務擁有再高的地位也不為過。我們自己的語文學歷史就是證明；我們只需想想在拉丁語語法變成現在的狀態之前所需的，那長達百年的準備過程。構建語言的每種形式都需要一個特殊的、只適合自身的表達方式。⁴⁷

正是通過對漢語等語言的研究，甲柏連孜認識到了語言的本質、語言的普遍現象，為語言學提供了基本概念、理論、模式和方法。反過來，正是依靠普通語言學的這些共性，他認識到長期演變而來的歷史語言學，諸如古代漢語，其語法“需要一個特殊的、只適合自身的表達方式”。而這一方式便是甲柏連孜的《漢文經緯》(*Chinesische Grammatik, mit Ausschluss des Niederen Stils und der Heutigen Umgangssprache*. Leipzig: Weigel, 1881. Reprograph Nachdruck: Berlin: 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1953; 4., unveränd. Aufl. Halle (Saale): Niemeyer, 1960) 一書。

在歷史上的文化碰撞、交流、互動、影響中，任何一種文化現象、歷史事件都必須在一個超越了自身的抽象的普遍性基礎之上，在與具體的現實關係之中，將自身作為一種普遍性的現象再次作理論上的闡述。不然的話，通過這些歷史現象的比較、研究，只能作為一種特殊性或局部的東西加以理解。歷史文化的特殊性只存在於它與普遍性的關係之中，如果沒有普遍性的話，特殊性也不會成立。理解《漢文經緯》，離不開他的《語言學》；而要深入領會甲柏連孜語言學的真諦，同樣也離不開他的中國哲學研究。

姚小平指出：“從16世紀末羅明堅、利瑪竇等西士來華、接觸中國語言計起，至19世紀末葉，三百年裡只有一個人能夠把漢語本體探索和語言理論研究這兩件事情做的同樣系統而出色，這個人就是甲柏連孜。”⁴⁸我認為，這樣的一個評價對於甲柏連孜來講，是恰當的。RC

註釋：

- 1 此書的德文版：Georg von der Gabelentz, *Chinesische Grammatik, mit Ausschluss des Niederen Stils und der Heutigen Umgangssprache*, Leipzig: Weigel, 1881. Reprograph. Nachdruck: Berlin: 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1953.; 4., unveränd. Aufl. Halle

文藝研究

- (Saale): Niemeyer, 1960. 日文版: ゲオルク・フォン・デア・ガーベレンツ 『中國語文法: 低級文體と現代の日常語を除く』 川島淳夫訳、IPC出版センター・ピブロス、2015年。中文版: 甲柏連孜著, 姚小平譯: 《漢文經緯》, “海外漢語研究叢書”, 北京: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15年。
- 2 此書的德文版: *Die Sprachwissenschaft: Ihre Aufgaben, Methoden und Bisherigen Ergebnisse*. Leipzig: Weigel Nachf., 2. Aufl.; 1.: 1891. Nachdruck: Tübingen, Narr, 1972 (TBL, 1). 日文版: ゲオルク・フォン・デア・ガーベレンツ 『言語學—その課題、方法、及びこれまでの研究成果』 川島淳夫訳、同學社、2009年。
 - 3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Die Ostasiatischen Studien und die Sprachwissenschaft”, in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Ein Biographisches Lesebuch*. Herausgegeben von Kennosuke Ezawa und Annemete von Vogel, Tübingen: Gunter Narr Verlag, 2013, S. 21.
 - 4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Die Ostasiatischen Studien und die Sprachwissenschaft”, in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Ein biographisches Lesebuch*. Herausgegeben von Kennosuke Ezawa und Annemete von Vogel, Tübingen: Gunter Narr Verlag, 2013, S. 23.
 - 5 *Thai-kih-thu, des Tscheu-tsi Tafel des Urprinzipes, mit Tschu-hi's Commentare nach dem Hoh-pih-sing-li. Chinesisch mit Mandschuischer und Deutscher Übersetzung, Einleitung und Anmerkungen.* (Promotionsschrift) Dresden: Im Commission-Verlag Bei R. v. Zanh, 1876
 - 6 *Thai-kih-thu, des Tscheu-tsi Tafel des Urprinzipes, mit Tschu-hi's Commentare nach dem Hoh-pih-sing-li.* Chinesisch mit mandschuischer und deutscher Übersetzung, Einleitung und Anmerkungen. (Promotionsschrift) Dresden: Im Commission-Verlag Bei R. v. Zanh, 1876, S. 10. 甲柏連孜後來在《漢文經緯》中也使用了《通書》中的例子來解釋“助詞”中的“代詞性小詞”“者”：“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Chinesische Grammatik, mit Ausschluss des niederen Stils und der heutigen Umgangssprache*, Leipzig: Weigel, 1881, Reprograph Nachdruck: Berlin: 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1953; 4. unveränd. Aufl, Halle (Saale): Niemeyer, 1960, S. 192.
 - 7 《朱子語類》卷94《通書》。
 - 8 甲柏連孜著, 姚小平譯: 《漢文經緯——漢語語法, 不包括通俗語體和當代口語》, 北京: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15年, 頁13。
 - 9 *Thai-kih-thu, des Tscheu-tsi Tafel des Urprinzipes, mit Tschu-hi's Commentare nach dem Hoh-pih-sing-li.* S. VI-VII.
 - 10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Die ostasiatischen Studien und die Sprachwissenschaft”, in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Ein biographisches Lesebuch. Herausgegeben von Kennosuke Ezawa und Annemete von Vogel*, Tübingen: Gunter Narr Verlag, 2013. S. 21.
 - 11 *Thai-kih-thu, des Tscheu-tsi Tafel des Urprinzipes, mit Tschu-hi's Commentare nach dem Hoh-pih-sing-li.* S. III-IV.
 - 12 *Le Livre de la Voie et de la Vertu, Composé dans le VIe Siècle avant l'ère Chrétienne, par le Philosophe Lao-Tseu, Traduit en Français et Publié avec le Texte Chinois et un Commentaire Perpétuel*, 1842.
 - 13 *The Book of the Way and of Virtue. Composed in the Sixth Age before the Christian Era by the Philosopher Lao Tseu.* 1856.
 - 14 *Thai-kih-thu, des Tscheu-tsi Tafel des Urprinzipes, mit Tschu-hi's Commentare nach dem Hoh-pih-sing-li.* S. IV.
 - 15 *Lao-Tse's Tao Te Kin: Aus dem Chinesischen ins Deutsche Übersetzt, Eingeleitet und Commentirt von Victor von Strauss*, Leipzig: Verlag von Friedrich Fleischer, 1870, 357 Seiten.
 - 16 雅斯貝爾斯著, 李雪濤等譯: 《大哲學家》,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0年第2版, 頁754。
 - 17 Neuauflage, *Lao-tse, Tao Te King. Aus dem Chinesischen Übersetzt und Kommentiert von Victor von Strauss*, Bearbeitung und Einleitung von Willy Y. Tonn, Zürich: Manesse Verlag, 1959, 420 Seiten.
 - 18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Chinesische Grammatik, mit Ausschluss des Niederen Stils und der Heutigen Umgangssprache*, Leipzig: Weigel, 1881, Reprograph. Nachdruck: Berlin: 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1953.; 4., unveränd. Aufl. Halle (Saale): Niemeyer, 1960. S. 266.
 - 19 同上, S. 266.
 - 20 *Thai-kih-thu, des Tscheu-tsi Tafel des Urprinzipes, mit Tschu-hi's Commentare nach dem Hoh-pih-sing-li.* S. V.
 - 21 同上, S. V.
 - 22 同上, S. VI.
 - 23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Die Ostasiatischen Studien und die Sprachwissenschaft” in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Ein Biographisches Lesebuch, Herausgegeben von Kennosuke Ezawa und Annemete von Vogel*, Tübingen: Gunter Narr Verlag, 2013, S. 26.
 - 24 同上, S. 27。
 - 25 同上, S. V-VI。

- 26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Die ostasiatischen Studien und die Sprachwissenschaft", in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Ein Biographisches Lesebuch. Herausgegeben von Kennosuke Ezawa und Annemete von Vogel*, Tübingen: Gunter Narr Verlag, 2013, S. 22.
- 27 *Thai-kih-thu, des Tschou-tsi Tafel des Urprinzipes, mit Tschu-hi's Commentare nach dem Hoh-pih-sing-li*. S. 10. Anm. 1.
- 28 *Chu-tzu-chieh-yao*, 1676, Libri sin. 63. 克拉普洛特-加龍省：《柏林王室圖書館中文和滿文圖書與手稿目錄》在題解中說：《朱子節要》：這裡收錄了12世紀宋代著名的哲學家朱熹的14篇哲學—道德論文，是由明代的高攀龍編寫，並於1602年（萬曆三十年）出版的。此書係《朱子語錄》及滿語譯文的雙語對照版，出版於康熙十五年（1676），五卷。Klaproth, J. H., Verzeichniss der Chinesischen und Mandschuischen Bücher und Handschriften der Königlichen Bibliothek zu Berlin, ... Paris, 1822. S. 143.
- 29 1833年老甲柏連孜用法文出版了他多年的學術研究成果：《滿文文法基礎》（*Éléments de la grammaire mandchoue*, Altenburg 1833）。1864年他還出版了《四書、書經、詩經滿文譯本，並附有滿—德詞典》（*Sse-schu, Schu-king, Schi-king in Mandschuischer Uebersetzung mit einem Mandschu-Deutschen Wörterbuch*, Leipzig: 1864）。在老甲柏連孜去世後，作為遺稿還出版了《大遼史——譯自滿文》（*Geschichte der Großen Liao, aus dem Mandschu Übersetzt*, Sankt Petersburg, 1877）。此外，他曾經從滿文將《金瓶梅》全部翻譯成了德文。此書後來經德國漢學家、滿文學家嵇穆（Martin Gimm, 1930-）整理出版。（"Jin Ping Mei 金瓶梅, chinesischer Roman", übers. v. Hans Conon v. d. Gabelentz, herausgegeben und bearbeitet, Berlin, Staatsbibliothek, Teil I-X, 2005-2013.）
- 30 "Kin Ping Mei, Les Aventures Galantes d'un Épicier. Roman Réaliste, Trad. du Mandchou"(Auszug). in *Revue Orientale et Américaine*, hrsg. von L. de Rosny, 3, Paris, 1879, S. 169-197. 姚小平在《漢文經緯》譯本“譯後記”中認為：“他（指甲柏連孜——引者註）把《金瓶梅》譯成法文（巴黎1879年），所據也不是中文原本，而是這部被歐洲評論家視為中國現實主義小說之典範的滿文譯本（康熙四十七年）。”（上揭甲柏連孜著，姚小平譯：《漢文經緯》，頁897）實際上，甲柏連孜並沒有翻譯整本的《金瓶梅》，這裡刊登的只不過是不到30頁的節譯而已。而他父親——老甲柏連孜已經將《金瓶梅》的全本翻譯成了德文。
- 31 請參考相應年份的《萊比錫大學總課程表》，如《1878/79年冬季半年萊比錫大學總課程表》（VERZEICHNISS DER IM WINTER-HALBJAHRE 1878/79 AUF DER UNIVERSITÄT LEIPZIG ZU HALTENDEN VORLESUNGEN）。
- 32 甲柏連孜著，姚小平譯：《漢文經緯》，頁21。
- 33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Die Ostasiatischen Studien und die Sprachwissenschaft", in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Ein Biographisches Lesebuch. Herausgegeben von Kennosuke Ezawa und Annemete von Vogel*, Tübingen: Gunter Narr Verlag, 2013, S. 22.
- 34 同上, S. 27。
- 35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Die ostasiatischen Studien und die Sprachwissenschaft", in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Ein Biographisches Lesebuch. Herausgegeben von Kennosuke Ezawa und Annemete von Vogel*, Tübingen: Gunter Narr Verlag, 2013, S. 27.
- 36 Clementine v. Münchhausen geb. v. d. Gabelentz (1849-1913), H. Georg v. d. Gabelentz. Biographie und Charakteristik (1913). in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Ein Biographisches Lesebuch. Herausgegeben von Kennosuke Ezawa und Annemete von Vogel*, Tübingen: Gunter Narr Verlag, 2013, S. 118-119.
- 37 同上, S. 119。
- 38 同上, S. 119。
- 39 甲柏連孜著，姚小平譯：《漢文經緯》，頁219-220。
- 40 "Das taoistische Werk Wên-tsi", in *Königlich-Sächsische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Philologisch-Historische Klass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 39, 14. 1887.
- 41 "Über den Chinesischen Philosophen Mek Tik", in *Königlich-Sächsische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Philologisch-Historische Klass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 40, 3, 1888, S. 62-70.
- 42 "Der Räuber Tschik, ein satirischer Abschnitt aus Tschuang-tsi", in *Königlich-Sächsische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Philologisch-Historische Klass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 41, 4, 1889, S. 55-69.
- 43 "Zur chinesischen Philosophie", in *Wissenschaftliche Beilage der Allgemeinen Zeitung*, Nr. 92. 1880. S. 545-547.
- 44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Die Ostasiatischen Studien und die Sprachwissenschaft", in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Ein biographisches Lesebuch. Herausgegeben von Kennosuke Ezawa und Annemete von Vogel*, Tübingen: Gunter Narr Verlag, 2013, S. 24-25.
- 45 同上, S. 25。
- 46 同上, S. 26。
- 47 同上, S. 26。
- 48 甲柏連孜著，姚小平譯：《漢文經緯》，頁900。





澳門世界遺產《鄭家大屋》（局部），始建於1888年，梁藍波攝，2018年